

中国未来 与 理念革命

ZHONGGUOWEILAIYULINIANGEMING

徐景安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

徐景安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 / 徐景安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095-0119-1

I. 中… II. 徐… III. 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6762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 27.75 印张 465 000 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定价: 50.00 元

ISBN 978-7-5095-0119-1/F·010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篇 中国经济改革方向

- | | |
|----|---------------------------------------|
| 3 | 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
——与刘国光同志讨论之一 |
| 7 | 中国改革的出路是创新马克思主义
——与刘国光同志讨论之二 |
| 11 | “反右防左”，还是“反左防右”
——与刘国光同志讨论之三 |
| 15 |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都是糟粕吗
——与刘国光同志讨论之四 |
| 20 | 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
——与刘国光同志讨论之五 |
| 26 | 重大改革理论问题研究要有所突破
——中政院第25次改革形势分析会发言 |
| 31 |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回应马宾等人对所有制改革的质疑 |
| 37 | 谁在开历史倒车
——回应巩献田对《物权法（草案）》的质疑 |
| 44 | 中国改革方向之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 53 | 回避不了的争论 |
| 58 | 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 |
| 64 | 姓“社”姓“资”斗争的历史教训 |
| 72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第二篇 中国政治改革选择

- | | |
|----|------------|
| 85 | “专政”还是“法制” |
|----|------------|

第三篇 中国发展的新理念

- 233 高举“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
理论大旗，走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对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建议书
- 248 意识形态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251 意识形态改革的基本思路
- 254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 257 新道德观：“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结合
- 262 要关怀民众的精神健康
- 265 何来创新能力
- 269 正确对待西方文明和儒家文化

第四篇 中国人的良心再造

- 275 要找善的理由，不要找恶的借口
——一论行善从我做起
- 277 提倡讲礼貌
——二论行善从我做起
- 279 我主张跪拜父母
——三论行善从我做起
- 282 年轻人为什么自杀
——四论行善从我做起
- 284 关怀人的情感
——五论行善从我做起
- 287 要有敬业精神
——六论行善从我做起
- 291 要爱护环境
——七论行善从我做起
- 295 要节约资源
——八论行善从我做起
- 298 人为什么要善
——寻找善的新理由
- 326 如何改进大学德育教育
——对燕京华侨大学德育工作的建议

- 330 道德新理念，德育新方式
——对“燕京华侨大学情感交流中心”志愿者的培训演讲
- 335 该不该倡导善，能不能做到善
——徐景安与网友对话
- 345 企业文化新探索，企业管理新思路
——对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管理层演讲
- 351 是办“教育”，还是搞“诈骗”
——中国高等教育需开展一场打假运动
- 361 为幸福而工作
——对深圳市一体医疗集团公司员工培训演讲
- 371 他们在创造中国的圣地
——安徽省庐江文化教育中心访问之一
- 373 感悟源于存心，存心源于感悟
——安徽省庐江文化教育中心访问之二
- 376 心境决定人生态度
——安徽省庐江文化教育中心访问之三
- 378 关心他人，升华自己
——对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情感互动中心”志愿者培训演讲
- 381 幸福哪里找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公司百家讲坛演讲
- 386 员工是目的，不只是手段
——对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建议

附录一

- 391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 405 刘国光在“11·23”研讨会上的发言
- 410 马宾等 105 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
- 420 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

附录二

- 428 网上评论

第一篇
中国经济改革方向

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

——与刘国光同志讨论之一

我与国光同志认识很早，我国的改革事业曾使我们在一条战线上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务院体改办参与方案的设计，国光同志作为学者进行改革理论的研究，经常在开会时碰面。在当时直接参与改革的理论工作者中，除薛暮桥之外，就是刘国光、蒋一苇了。一苇以倡导“企业本位论”而闻名，国光偏重于宏观经济的研究，主张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说，国光是对我中国早期改革有影响、有贡献的学者之一。1987年，我离开北京来深圳参与改革，就没有再见到国光同志了。

事过20多年的今天，我看到国光就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发表的一篇谈话，使我震惊不已。政治性之强、火药味之浓、观点之尖锐，不像是一个学者的语气。震惊之余，我认为国光同志谈话的意义在于捅破了改革28年来的一层窗户纸。他提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实质是对中国改革28年的评价，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对这场改革性质的认识，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人们私底下都有议论，各有各的看法。但在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不争论”的方针指导下，大家都不公开讲。今天国光同志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认为，捅得对、捅得好。今天是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层思考的时候了。

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中国面临重大抉择：一是倒退，回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二是照旧，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三是创新，探索一条

新的现代化道路。我建议，中央就国光同志提出的问题，发动、组织理论界好好讨论，理论上、思想上再不能“和稀泥”、“不争论”了。我就此抛砖引玉，谈谈我的看法。

先讨论中国 28 年改革的理论取向，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理论？国光同志在谈话中指出：“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接着，国光同志谈到，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教材编写、教师队伍，直到教育领导权等等都存在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排挤，西方经济学受重用。

国光同志谈的虽然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存在的问题，但实质是关系中国改革的理论评价。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时，国光同志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既然，中国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西方经济理论没有什么指导作用，那么怎么会出现“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问题呢？这就不符合逻辑了。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对邓小平同志发动的这场改革有个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抓改革，是基于对国情的基本判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落后 50 年。为此，小平同志决意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错误倾向，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为中心。要发展经济，党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做法，实行鼓励个人致富、鼓励百姓消费两大政策。释放百姓长期受压抑的追逐财富的能量，释放百姓长期受压抑的消费欲望，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了原动力。这也就使我国从“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鼓励致富是增加供给、鼓励消费是刺激需求，灵活有效的调动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只能依赖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我国发展经济与改革体制的必然选择。

在党内思想阻力重重，动不动就用姓“社”姓“资”来阻挠改革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利用他的政治权威，封住反对者的嘴，提出“不要争论”，“大胆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政治判断，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而在经济领域，开启了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以西方市场经济制

度为参照的开放与改革，西方的经济理论、西方的经济制度、西方的经济目标、西方的经济法规，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以至洋文化、洋习俗、洋名字都成为当今中国的时尚。

从经济来说，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是我国现代化的目标，GDP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价值观来说，崇尚物的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被奉为国策，民众则崇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

从体制来说，市场经济制度是以明晰的产权为前提的，为此我们放弃了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发展私有经济，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改为公司制。资源配置放弃计划分配，改由市场发挥基础作用，除少数价格由政府控制外，大部分放开实行市场定价。国家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主要实行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调节。开放股票、期货、债券等资本市场，还有房地产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要素市场。

今天看，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嫁接。不过，小平同志对于这种嫁接，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光同志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改革的趋势，将带来对这三大前提的冲击和威胁。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按需分配以及劳动价值论在改革中被抛弃或遭质疑。这就反映到“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更使他气愤的是：“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发生了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危机。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冲击。传统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计划分配。改革的市场化过程，就是公有制被削弱、计划分配被减少的过程，也就是背离传统社会主义的过程。所以国光同志说：“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而对鼓吹西方市场化

的理论，国光同志非常愤怒的指责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

第三，对共产党领导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我党的奋斗目标。改革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的冲击，就会使党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就会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一个现象：改革越推进，经济越发展，百姓民众的思想却离开党越远。国光同志忧虑地说：“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退回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继续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前景是如此凶险。国光同志说：“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完全赞同。然而，国光同志全部谈话中最正确、最宝贵的这句话，他却并没有展开论述。国光同志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又荣获了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那应该重点说说，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什么，中国改革的出路又何在？可惜，国光同志没有说，这正是我愿意与国光同志讨论的话题。这也是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2006年1月20日）

中国改革的出路是创新马克思主义

——与刘国光同志讨论之二

邓小平同志开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方式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提高，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华振兴得以初步实现。小平同志在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情况下，毅然实行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探索。

但凡嫁接或移植，就有诸多后遗症和不良反应。嫁接、移植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对后遗症和不良反应的克服，并创造一种崭新的肌体。

嫁接或移植必然遭到原肌体的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统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理念在改革中被推翻、被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话没人听、他们的书没人看，他们被冷落了、被边缘化。国光同志的谈话较多地反映了这些人的情绪。国光同志本人对原先的改革是积极的，但改革的结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们中希望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是不现实的，但他们政治上的敏感性，即西方现代化和西方市场经济的理念可能威胁共产党领导的警觉，有一定道理。

海归派为代表的西方型学者，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操作层面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对西方经济与体制模式的运作知识和技能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他们的话有人听、他们的书有人看。他们成了政府部门、学术单位、咨询机构的座上宾。这也就是国光同志惊呼的西方学派占据了主流地位和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运动中起着启蒙、推介作用。他们功不

可没。他们中要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西化的主张，有的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全盘西化是当今中国无法接受的，也不应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既超越传统社会主义，也要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既要继承东方文明，也要吸收西方文明。历史责任落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身上，这就是在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再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再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传统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选择，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但这不应是中国的未来。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物为本位，即物的生产、物的占有、物的消费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尺度。西方现代化引导人对物的过度追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绝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因此，西方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众多。中国更不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眼下的中国也仅仅少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8亿农民还离现代化相当遥远，却已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瓶颈。

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成功地从“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面临一个新的伟大转折，即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以和谐为核心的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可是全党没有认识到这个新转折，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口号停留在“政治为本位”的年代，经济领域的一些口号停留在“物本位”的年代。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概念混淆、理论混乱的现象。

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面临的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党的十七大应该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应该是新转折的起点。

党和国家面临许多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先进性、资源瓶颈、环境保护、反腐倡廉、贫富不均、社会治安、维权运动、加强民众及年青人的教育、港澳治理、台湾统一、与美国抗衡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治党治国理念的创新，也就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

为了迎接挑战，我们的武器库在更新，然而最迫切的是我们的思想武器需

要更新。事实上，我们的思想武库也在更新，问题是不系统、不完整、不配套，发生“新瓶装旧酒”或自相矛盾的现象。

所以，我提出了改革意识形态的建议。一说意识形态改革，有人就会敏感和紧张。其实，意识形态改革是十分正常的。西方的宗教被民众接受，是经过了宗教改革运动；佛教传入中国，融入社会，也是经过了改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今天，党的意识形态同样需要改革，需要与时俱进。今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要改革、要创新、要发展。

国光同志一方面认为：“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谓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而另一方面国光同志又非常惧怕意识形态改革，尤其反对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变革，说是“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其实，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意识形态改革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创新，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改革。当然，意识形态改革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可能是国光同志担心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泛滥。所以，十分忌讳意识形态改革。这就带来三个问题：

一是在不倡导意识形态改革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创新就成了一个口号、一句空话。尽管国光同志非常正确的指出，“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改革28年了，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什么样，至今没有人说得出来。

二是马克思主义创新，一定是吸收他人、他类的先进思想，这就必然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非马克思主义如此恐惧，又祭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这样的思想境界怎么能创新马克思主义？

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谁来评判？若不提倡意识形态改革，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也会以背离马克思主义而遭否定。

据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是1964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后在“文革”中被撤销了。我很感兴趣，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宗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还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我相信，口号一定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正如国光同志也强调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捍卫，用马克思的话评判是

非；而不是创新，用实践去检验、修正、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希望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出路也在于创新。问题恰恰在于我们不进行创新、不鼓励创新。中国缺乏创新的意思、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制度、创新的管理、创新的环境、创新的胸怀、创新的气度、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提出改革意识形态的本意。事关我国的前途和命运，我愿与国光同志继续讨论下去。

（2006年1月22日）